

学/术/名/著/文/库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ZHUXI DE SIWEI SHIJIE
朱熹

的

思维世界

田浩 著

(Hoyt Cleveland Tillman)

◎ 学 术 名 著 文 库 ◎

田
浩
著

朱熹的思维世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SK 2468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的思维世界/田浩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

ISBN 7-5613-2468-5

I.朱… II.田… III.朱熹(1130~1200)-理学-研究 IV.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9044 号

责任编辑 文思齐
封面设计 张卓慧
责任校对 胡利侠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4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20.00 元

开户行:光大银行西安南郊支行 账号:0303070-0033000469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 话:(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E-mail: if-centre@snuph.com

《学术名著文库》出版前言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自古以来，中国人文学术就以此为学术价值的最高追求，但只有在本世纪的近百年间，各研究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相继自觉地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方面不断汲取一切外来的先进学说，一方面又不忘记我中华民族的本来地位，在各自的专门研究中，开拓出一条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化传统为现代的学术转化路程，才真正使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使“天下公器”的理想成为现实。这无疑是贯穿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主线，是世纪之交各学科研究的主题，也是我们策划出版这套文库的主旨。

这套书之所以取名《学术名著文库》，主要因为它所收书籍，(1)均非初刊新作，而是早在海外出版并流行多年、为学界普遍认同确属“一家之言”的纯学术成果；(2)其作者无论是国内外学养深厚的学术界前辈或正当盛年的华人学者，还是真诚热爱并献身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学

者,皆为长期执教、就职于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纯正知名学人;(3)其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虽各有千秋,其一家之言与价值取向虽各有所属,但其学术价值已为学界公认,皆是可供学苑比较研究而又无可替代的有心之作。

这套书今有幸面世,乃是作者、策划者和出版者有缘合作的结果,也是策划者和出版者多年的夙愿。我们热忱希望能继续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支持,不断充实这套书的阵容。我们深信,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共同努力,这套书将蔚为大观,成为 21 世纪学术出版园地中的精品。

1998 年 8 月

余英时先生序

田浩的《朱熹的思维世界》英文原本出版于1992年。我曾为该书写过一篇简短的“前言”，略述其特色与贡献，以备西方的读者参考。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问世，作者也希望我再写一篇“前言”，我觉得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了这一愉快的任务。但中文本并不仅仅是英文本的单纯翻译，在中译的过程中，作者对原著又进行了扩充和修订，所以呈现在中文读者眼前的，其实是一部更完备、更缜密的新著。正因如此，我这篇“前言”也不能不另起炉灶，而且面对中文的读者，我事实上也必须重新写一篇不同的“前言”。限于时间，这篇“前言”仍然只能是很简短的。

首先我要指出，此书不但是一部思想史的研究，并且注重思想的社会背景，因此也可以说是思想史与社会史交互为用的研究。这和一般哲学史的取径颇有不同，而各有短长，但决无法互相取代。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尊重不同的研究方式同时并存。我自己的倾向自然是和本书作者比较接近的，但是我也深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式有其本身的限制。这种研究的长处是能把思想的发展放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等情境中求得了解，因而予读者以既生动又具体的印象；其短处则是稍不经意即容易流入某种方式的化约论以至决定论，使思想的自主性消失在外缘情境之中。本书恰恰发挥了这一研究方式的长处，而避免了它的短处。作者运用史法的圆熟和整体论断的均衡是特别值得赞扬的。

《朱熹的思维世界》事实上是一部南宋道学史。作者在本书中

用“道学”为总持的概念以通贯全部的讨论,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抉择。作者认为“理学”一词专指程朱一派的哲学立场,不能用来范罩整个南宋时期;他又指出英文“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之称现在已泛指“宋学”,未免失之过宽。这个“正名”的问题十分紧要,但又确实相当麻烦,很难得到满意的解决。语言虽然是“约定俗成”之事,可是名词的涵义在不断使用之中便会发生或广或狭的变化,例如 Neo-Confucianism 一字,最初正是卜德(Derk Bodde)用来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十章和第十五章所标“道学”之名的,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扩大了涵义,超出原来“道学”范围了。

“道学”一词更是变化多端,难以董理,作者在此书中则对它的内涵加以明白的规定。作者不取《宋史·道学传》的“道学”观念,因为这是程朱学术变成钦定的“正统”以后的狭义用法。相反的,作者主张回到北宋早期对于“道”和“道学”那种较为宽阔的理解;因此他说道学涉及儒家理论中互相关联的三个层次:(1)哲学思辨,(2)文化价值,(3)现实政论。不但如此,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学人过度醉心于宋代“形而上学”——即第一个层次——的研究,因而不免对其他两个相关的层次有所忽略,这正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思想史研究和哲学史研究之间的不同。

我很同情作者所采取的立场,只有对“道”和“道学”作广义的解释,才能较好地处理南宋儒学的内部问题,包括它的多样性和实践性。《宋史·道学传》中的程朱“道学”虽然因为正统化的缘故变得狭化和僵化,但朱熹本人对“道”和“道学”的看法仍然保持了早期的阔大的气象。在他所辑《五朝名臣言行录》中,保存了刘彝对于他的老师胡瑗的一个素描:

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其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瑗

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学以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二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也。（卷十之二，“安定胡先生”条）

今人征引此节往往从《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转手，不知其文曾经朱熹编定。程伊川也出于安定门下，他在太学时所写《颜子所好何学论》今仍存文集中。我们可以说程、朱关于“道”和“道学”的见解大概也曾受到胡瑗的启发。作者的三分法自然与胡瑗体、用、文的判划不同，但以范围而论，则不得不说是大体相近。（作者在英文文本中曾提到胡瑗的体、用、文，中译本则已略去）

作者把南宋道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着眼点主要在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期很有助于读者对于南宋道学的演变过程的认识。根据这一分期，我想提出以下的观察：第一时期（1127～1162年）是南宋道学的准备阶段，但同时也是儒学从北宋转入南宋过渡阶段。北宋时代二程已提出了“道学”的新观念，而且道学的基础也已在周、张、二程手上稳固地建立起来，但是道学在当时仅仅是儒学复兴中的一个旁支，尚未能取得主流的地位。北宋儒学主流其实是王安石所代表的新经学和司马光所代表的新史学。这是熙宁、元祐党争的学术核心之所在，二程在其时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影响力。即以道学的内部而言，程门高弟对道学的信仰究竟坚定到什么程度，也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否则朱熹也不会慨叹他们“下梢都流入禅”了。用当时的话说，道学在北宋还没有“鞭辟入里”。南宋道学的第一期便是为道学的再出发作准备的。

道学真能“鞭辟入里”是第二、第三期的事。这是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诸巨儒在学术思想上特别活跃的时代。这里所谓“鞭辟入里”并不仅在哲学思辨的层次为然，即在文化价值和政论的层次上也是如此。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二程虽有不少弟

子问学,但并没有正式讲学的机构和组织。程颐退休洛阳时,甚至谢绝门人追随前来。书院成为道学的传播中心是朱熹和陆九渊时代的新发展,如白鹿洞书院和象山书院之类,尤其是道学得以流布天下的关键。若以作者所采取的广义而言,道学在第二、第三期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创造力也十分旺盛。陈亮所反对的“道学家”是所谓“闭眉合眼,朦胧精神”一流人物,这正代表着最狭义的“道学”的颓波,他决没有把朱熹、陆九渊包括在这种“道学家”之内。相反的,从广阔的观点说,朱、陆等人也未尝不认为陈亮仍是“吾道中人”,否则“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之间便不会发生那么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辩了。

第四期始于朱熹身后,下至南宋之亡。道学虽在这个阶段被朝廷尊为正统,但已失去第二、第三期的多彩多姿和蓬勃活力。朱子一家的道学成为政治上的正统思想发生在宋理宗一朝(1225~1164年)。以“理”字为庙号,古今只此一家,这正是因为他“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书》……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宋史·理宗本纪赞》)但事后回顾,这毋宁是一个辛辣的反讽。理宗皇帝不但象征了“理学”的式微,而且也标志了宋朝的衰亡。宋太祖早年咏月,尝有“才到中天万国明”之句,气象万千,一直被看做是宋朝兴起的朕兆。理宗题诗于太祖诗后,竟作“并作南楼一夜凉”的萧瑟语。故元儒刘因题《宋理宗南楼风月横披》之二云:“谁知万古中天月,只办南楼一夜凉。”(《静修集》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诚可谓慨乎其言之。我觉得刘因的诗句也恰好可以移用于南宋道学的盛衰。道学在朱熹的时代正如“万古中天月”,但到了理宗之世也不免使人生“南楼一夜凉”之感了。

最后,我想谈一谈本书所流露的作者的思想倾向,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作者是20世纪的美国史学家,他自己的文化价值自然偏向于多元、宽容,而不能接受学术思想之定于一尊。但是作者治史则尊重客观,不以一己的好恶进退古人。现在作者写南宋道学

史,最后必须归结到程朱成为钦定的道学正统,他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他所处理的历史事实之间恰恰发生了直接的冲突。我相信作者在材料的取舍和组织方面必不免因此而大费斟酌。本书不列朱熹为专章,而每一章都有朱熹,其原因之一也许便是要避开道学正统问题的困扰。这样的处理方式若在哲学史论述中自有商榷的余地,但在以呈现南宋“思维世界”为主题的思想史研究中,却不失为别开生面。作者对朱熹的历史地位和尊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自己的价值取向则在有意无意之间阻止了他把朱熹推向道学正统的位置。在南宋时代,朱熹代表了道学中的主流,这是无可否认、也不必否认的历史事实,本书充分地揭示了这一客观的事实,但正统则是权力结构的产物,这是作者所不肯认同的。承认主流而不认同正统,作者的自由主义的立场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朗。

在作者所处理的几位南宋儒学大师中,我发现他对于吕祖谦最具有同情的了解。这可能是由于吕祖谦代表了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吕祖谦无论对于朱熹、陆九渊或陈亮都表现出十分宽容的精神,朱、陆的鹅湖之会也是他一手安排的。更有趣的是,作者特别引了吕祖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话来证明他的“包容倾向”,但是作者似乎并不知道这句名言是中国自由主义者胡适曾经大力宣扬过的。作者和胡适不谋而合,特别欣赏这句话,正因他们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相近的。历史的客观和历史家的主观是相反相成的,历史在每一个时代都必须重新研究、重新撰写,这是因为史学工作不仅是已往事实的重建,而且也是当前意义的创新。

1996年3月15日序于普林斯顿

谢 辞

“知人论事”实为史学家最大的乐趣。我在钻研南宋道学的过程中,经由“观其书,知其人”,尝试重建一个活生生的义理传统。

宋代的思想人物虽然与我生处的时代与文化,距离相当遥远,但体会他们面临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困境,依然是我锲而不舍追求的目标。拙著试图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回溯往事,希望能够陈述、解释南宋思想家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意义。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对日后的中国文化、哲学及政治发展都影响甚巨。即使我对朱熹的思维世界的理解可能有所偏差,本书仍然以尽求周全的态度,交代朱熹以及其同时人物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脉络。

由于翻译撰写本书的中文稿,我有机会扩充及修订英文原著对南宋道学的认识;这次重新阅读南宋思想的史料,使我能够提供一项比英文旧著更详尽、更精谨的论述,并且进一步发挥、澄清原来的论证。

本书得以完成必须感谢许多散布各地的老师、同事及友人,他们不仅给我必要的鼓励,并且使我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理解更加丰富。虽然难以一一致谢,我仍然必须提及以下几位特别协助本书的朋友。首先,我得感谢余英时教授在 1992 年为英文原著写作前言,现在又为中文版再写一篇前言,使本书生色不少。以前在亚历桑纳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读书的牛朴、冀小斌先生为我翻译最初的草稿;黄进兴、池胜昌、黄明理、俞宗宪、程一凡及刘景修先生提供许多修改草稿的宝贵意见。池胜昌先生从纽泽西(New Jersey)来到亚历桑纳,前后辛勤工作 40 余日,将草稿作

最后的重新修订,不但润饰中文的写作风格,并使译文能够更忠实于我的本意;允晨文化公司的夏国安小姐则负责联络与编辑的作业。他们慷慨的协助与建设性的意见,使本书得以中文的面貌出现。姜长苏先生帮忙通读了西安的校稿。

此外,我必须向美国亚历桑纳州立大学的同事表达谢意。图书馆中文部的武爱华女士帮忙取得许多中文的资料;研究院及历史系提供牛朴、冀小斌两位同学奖学金,使本书的构想得以初步实现。Brian Foster 与 Noel Stowe 两位院长,以及 Retha Warnicke、Robert Trennert、Albert Hurtado 诸位教授的协助亦不可缺。

我也必须感谢妻子宓联卿女士,以及子女田亮、田小梅,他们在我觉得写作此书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时,仍然使我感到生活充满乐趣,并且使我的思想能够保持平衡,不致一去不返,迷失在遥远的南宋时代。

今天我若对学术有些许的贡献,必须感谢求学时代诸先生的教诲,与尔后不断的勉励。在中国思想的研究领域里,我尤其受益于余英时及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的指导,因此谨将本书呈献给两位敬爱的老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余英时先生序	(1)
谢 辞	(6)
绪 论	(1)

第一部◎第一时期

1127~1162 年	(15)
第一章◎南宋第一代学人:张九成与胡宏	(22)

第二部◎第二时期

1163~1181 年	(37)
第二章◎张栻	(46)
第三章◎朱熹与张栻	(62)
第四章◎吕祖谦	(91)
第五章◎朱熹与吕祖谦	(115)

第三部◎第三时期

1182~1202 年	(151)
第六章◎陈亮	(167)
第七章◎朱熹与陈亮	(185)
第八章◎陆九渊	(220)
第九章◎朱熹与陆九渊	(237)

第四部◎第四时期

1202~1279 年	(275)
第十章◎朱熹门人与其他道学家	(281)

结语	(302)
----	-------

参考书目	(315)
------	-------

绪 论

目前对宋代儒学发展的研究大致仍反映传统中国、日本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传统的观点和方法仍占据研究的主导地位,亦即以朱熹(1130~1200年)的道统为主线,将重点放在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和为数不多的前后学人身上;这种传统的观点可以上溯到元人编纂的《宋史·道学传》。这部官修史书为道学界定的范围很狭窄,朱熹在这体系中成为集儒学理论大成的学者,少数的学者如“北宋五子”被当做他的理论先驱,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象山,1139~1193年)被视做陪衬,13世纪的几位后学则因为推动朝廷支持道学而受到赞扬。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在14世纪格外注重朱熹,颁布法令把朱熹的《四书》注释当做科举考试最基本的内容,官修的《宋史》也有专门的“道学”列传讲述朱熹学派的思想、著作和发展。甚至到20世纪初,朱熹依然是儒家正统学说的中心,他的思想影响并扩及日本、朝鲜,成为近代东亚政治文化、传统教育的理论基石;因此当代对南宋儒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的诠释或者意识形态的实践,也就不足为怪。这些研究虽然成果斐然,但我们对这时期的道学仍然缺乏一套全面而且系统的看法,本书的目的就是意图填补这个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讨论道学思想在南宋时代的发展变化。

本书不将朱熹看成一位超然独立的思想家,而将他的思想发展置于他与同时代学人的关系和交往的背景下考察。这种历史的方法是要补充以朱熹哲学为重点的研究,不是重复过去的研究。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贬抑朱熹的思想地位,而是把他放回到当时周

遭的学术环境中了解,因为朱熹同时代人的贡献一直被后人所忽视。研究朱熹与当时学者的思想交流,可以使我们对朱熹以及他的思想发展有不同的了解。借用朱熹的话来说,本书要探讨他怎样演变成所谓“吾道”、“斯文”、“醇儒”、“吾党”和“道学”中的代表人物,而这些字眼显然不仅指涉一批具有共同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

宋代道学是一个广义的学术群体,朱熹只是其中的一员。道学初期的多样化倾向(diversity),随着正统逐步确立,渐渐变得不太明朗,一些重要的道学家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已经失去本来的面目。我在1982年出版 *Utilitarian Confucianism: Ch'en Liang's Challenge to Chu Hsi* (《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开始从12世纪的背景观察道学。最近几年学术界对于宋代儒学部分名词的讨论,已经达成一些共识。冯友兰先生(1895~1990年)在1983年要求当代学者讨论宋代儒学时,采用北宋及南宋时期使用的较广义的“道学”一词,而不继续沿用南宋末年以来狭义的“理学”。^① 姜广辉先生在1992年列出更多证据,支持冯先生对宋代道学的见解;^② 可是许多中国学者犹未能避免道学就是理学的看法。最近愈来愈多美国学者开始使用“道学”一词,但令人遗憾的是,部分学者仍然未能明白分辨“道学”与定义十分不明确的“Neo-

① 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各称和形式》,收入中国哲学史学会编,《论宋明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7-56。

② 姜广辉:《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中国哲学》(1992年),第15辑,页240-246。

Confucianism”——“理学”、“新儒学”等说法。^① 学术界对宋代儒学的讨论发展到现阶段,需要整体回顾道学的发展历史过程。我们不应该再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南宋这段历史,而要重现它历史发展的过程,以探讨道学群体的思想,我们也不应盲目接受 1340 年代蒙古人统治之下所编修《宋史·道学传》的狭隘观点,而要采取较为开阔的眼界;例如,可以依据早期道学的历史著作《道命录》来考察道学的发展。^② 这种较广阔的观点在 12 世纪的文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所以我使用“道学”概括这个群体从 11 世纪晚期到南宋末叶的发展变化。道学的主要人物间的确有一些根本的哲学分歧,但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的纽带将他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些纽带的作用比他们的共同理念,其影响力可说毫不逊色。

后面的讨论会更清楚显示,对道的探究产生专有名词“道学”。我认为“宋学”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统称,而“道学”则是“宋学”的一个分支。当代部分学者称“宋学”为“Neo-Confucianism”,可是我会避免使用这个字眼。“道学”不等于程朱哲学(有些学者称“程朱哲学”为“Neo-Confucianism”或“Neo-Confucian orthodoxy”理学正统);但本书要证明宋代道学的范围比程朱的哲学广泛。这个群体由于献身道学的人士努力而日益发展扩大,此群体内外的人逐渐开始使用“道学”来指称这个特别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群体,它虽然仍然与宋代儒学以及传统儒学的范畴有关,但已经与他们有所

① 关于这个讨论及其哲学的意义,参见拙作“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 3 (July 1992), p. 455~474;及“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 Revisited,” *Ibid*, 44. 1 (January 1994), pp. 135~142。

② 李心传:《道命录》(百部丛书集成本)。又参见,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王德毅:《李心传年谱》,收入《宋史研究集》第9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页513~573。